

• 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地丛书 •

Yu Kuaguo Gongsì Hulian

与跨国公司互联

提升首都企业技术学习与创新能力



范黎波 宋志红 吴易明◎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地丛书

与跨国公司互联——提升首都 企业技术学习与创新能力

范黎波 宋志红 吴易明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跨国公司互联: 提升首都企业技术学习与创新能力/
范黎波、宋志红、吴易明著.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12
(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地丛书)
ISBN 978 - 7 - 5017 - 8360 - 1

I. 与… II. ①范… ②宋… ③吴… III. 企业管理—技术
革新—研究—北京市 IV. 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092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 economyph. com](http://www.economyph.com)

组稿编辑: 刘一玲 (电话: 010 - 68359417)

责任编辑: 刘 勇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任燕飞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 × 1000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8360 - 1/F · 7352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69586 68346406 68309176

自序

中国各个产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惊人地相似:产品的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产品价值链中最赚钱的部分)基本都依赖进口,在缺乏核心技术和部件的情况下,许多产业的进入壁垒和行业集中度比较低,企业盈利能力高度依赖于销售能力和渠道,盈利水平容易受外部经营环境的影响,起伏很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技术瓶颈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企业究竟应如何作为?一些观点主张应转换路径,以我为主;一些观点认为应继续现有路线,以引进和吸收学习为主,逐步实现自主创新。我们认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与溢出仍是目前“中国制造”技术发展的主要路径。

外国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利益中十分重要的一项便是技术转移和溢出。传统上,跨国公司利用其技术优势,通过外部市场交易,如转包合同、许可证贸易等途径将技术转移到东道国当地企业;现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化(母子关联交易)方式进行技术转移,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提高了技术应用效率,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技术创新。

技术转移对东道国的技术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促进了技术资源流入和优化配置,提高了知识、技术和信息共享的程度;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日益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促使跨国公司更加积极主动地转移技术,技术溢出效应会越来越明显;随着东道国企业吸收学习能力的提高,自主创新的成功率会越来越高。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研发投入力度的加强,负面效应也会越来越突出:跨国公司通过研发机构的组织体系强化技术垄断;对东道国企业学习技术设置障碍;遏制东道国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

如何更有效地获取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与溢出的效益,关键因素:其一,市场激励与技术溢出效应正相关。传统思维定式认为,创新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内部因素,即研究开发、技术应用和流程再造等。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了市场竞

争、结构调整、消费者新增需求等对创新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其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研发开支与东道国市场和销售业绩的重要性正相关。东道国子公司销售额越大,跨国公司投入研发活动的动力就越大。这一点对中国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更好地运作市场,对跨国公司技术投入的吸引力才会更大。其三,东道国企业的吸收学习能力直接决定了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意愿和力度。其四,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溢出效应正相关。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战略考量主要取决于其技术优势丧失的风险和东道国市场的长期前景。其五,产业集群的规模和效率。在一个产业集群内,优势企业及相关的支持企业之间高度分工、高效合作,共同搭建了一个支持产业升级与企业持续发展的资源平台,尤其重要的是集群内知识流动非常快,共享程度高,因此成为集群内企业获取技术知识和创新思维的重要渠道,大大增加了集群内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

技术转移与吸收学习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漫长的、互动的过程,无法逾越。从历史的角度看,技术转移与学习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在此技术路径上,企业的技术能力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①简单的拿来主义阶段和复制模仿阶段,即“干中学”阶段。②模仿创新阶段。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将自己内部的技术资源与引进的技术知识结合起来,从而有可能形成新的技术和拓展新的市场。③自主创新阶段。企业可以对已有的技术资源进行综合和转化,在此基础上便有了创新,“企业技术转化能力”获得了质的飞跃。企业在引进和装配的基础上发展成为 OEM(贴牌生产)厂商,掌握了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的技术技能,并成为低成本制造商。随着技术引进和消化能力的增强,OEM 厂商发展成为附属的、低利润的 ODM(原始设计制造商)厂商;当 ODM 厂商具有了一定的新产品开发能力,能够利用独立开发的应用性技术为原外国厂商提供技术设计和支持服务时,标志着它已经发展到了较具控制力、垄断性和高利润的原始品牌制造商(OBM)。最终这些企业可能成为自有品牌的制造商。

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必须具有长期的战略眼光。国际产业链整合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因此,基于吸收 FDI(外商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应更加理性地整

合国外直接投资、价值链管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包括国际与国内)四个要素,建设具有开放性的整合优势。国际产业链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这个平台上的技术信息丰富,参与企业通过知识共享和互相学习,不仅可以大大改进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且能够加快核心技术和应用技术的开发,并提升人力资源的开发效率。从企业创新体系建设角度分析,中国企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企业内部创新体系和创新机制问题。首先,要进一步突出技术专家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技术专家、资本持有者和企业家应被平等对待。其次,要建立科学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激发员工的创新潜能。从国家创新能力建设角度分析,政府在公共创新设施方面需加大投入力度,在基础性研究方面要进行大规模投资,对具有商业潜力的创新开发项目则交由企业或私人部门进行。政府要确定行业的主导要素,然后通过刺激主导要素发生变化并激励创新。

与当年日韩企业不同,我们正享受着——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也许正因如此,企业似乎没有太大快速更新产品的压力。这也直接导致了对引进技术的偏重和对消化吸收乃至创新的忽视。结果,中国企业缺乏日韩企业对新产品开发的执著追求。如在信息产业领域,我们几乎从零起步,先是代理,后来模仿制造。虽然我们可以与国外企业同步制造计算机,可以与国外企业同步进行网络集成和软件开发,但却没有形成产业规模,也没有培育出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2004年迈克尔·波特的中国之行,曾被问到中国在OEM与发展核心技术之间应如何选择?大师的回答非常明确:中国要想繁荣,就必须走发展技术的道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是学术界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把“引进外资和技术转移与溢出作为研究的起点,学习与创新能力提升作为研究的归依”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主题创新。俗话说:“秧好一半谷,妻好一半福。”引伸来看,主题选得好,文章就可以说成功了一半。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方法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

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年版,第66页)科学研究,贵在创新。

一位哲学家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分为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以我观之一意见”。这一阶段的写作往往未能对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作系统深入地研究考察,未充分占有资料,不了解研究对象的进展情况及各方面的矛盾,作起研究来“前无古人”、“旁若无人”,尽管很费心思,难免“管中窥豹”,停留于点滴、零碎的感想,只能称做姑妄言之,不能称做研究成果。第二种境界是“以物观之一知识”。这种研究有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考证和分析,能帮助人们了解事物,增加读者的知识。但理论概括、提炼不够,停留在就事论事,较为片面、孤立、静止的阶段,未形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相互贯通的理论系统,因此,难以成为上乘之作。第三种境界是“以道观之一智慧”。“道”被老子称为“万物之宗”、“用之不盈”。这是一种哲学理念、世界观、方法论。上乘的研究成果,就应当超越意见和知识,达到启迪人们智慧的效果,是一种具有哲理、充满智慧、含蕴丰富、值得反复阅读的高品位精神食粮。

中国企业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已经进入了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未知领域。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中国走的是“跨越型发展”路径,需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重复和完成西方曾走过的100多年的发展道路。在将来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将继续持之以恒地探寻“引进外资—市场激励—技术转移与溢出—价值链管理—人力资本开发—学习与创新”等行为之间的联系与促进关系,努力从技术转移与溢出中发现适合于中国企业学习与创新的“道”。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与学习战略研究——中国的实践与印度的经验”(项目号:70572077)的阶段性成果。本书的主要内容 by 范黎波和宋志红撰写,吴易明教授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并参与了本书部分内容的编写。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还得到了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李群虹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张新民教授、林汉川教授、叶文楼教授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范黎波 宋志红

2007年11月20日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引 言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8
四、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12
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13
第二章 从本土市场看中外企业的竞争与合作	16
一、跨国公司在市场所受的制约	17
二、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所具有的优势	19
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策略的博弈分析	20
四、跨国公司在华的基本经营策略	27
五、结论与启示	31
第三章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技术扩散、吸收与 学习能力的理论研究	33
一、关于技术转移的理论	33
二、FDI 的技术扩散的研究	38
三、FDI 的吸收与东道国学习能力的研究	40
四、扩展的吸收与学习能力研究	45
五、简要评述	47
第四章 与跨国公司互联的必要性分析 ——基于首都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现状的 实证研究	48

一、引 言	48
二、变量与研究假设	49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	51
四、结论与启示	60

第五章 与跨国公司互联的途径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模型和关联性要素分析	62
一、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一般模型	62
二、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动态模型和关联要素分析	65
三、技术转移与吸收学习的交易规则	74

第六章 中国企业的技术学习战略和技术选择战略

决策模型	82
------------	----

一、中国企业的技术学习战略	82
二、技术选择战略决策模型	85

第七章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及其对中国企业

技术发展的启示	90
---------------	----

一、跨国公司在京的研发投资背景	90
二、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动因	97
三、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活动的现状	100
四、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研发中心的规律	106
五、首都企业的技术发展对策	115

第八章 制造业产业链全球化与首都制造业

发展对策	118
------------	-----

一、国际产业分工演进与制造业全球化	120
二、制造业的跨国转移	126
八、外资企业与我国的加工贸易：一些启示	128
四、北京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130

五、北京制造业发展路径	133
八、结论与启示	144
第九章 “集合产业集群”与北京产业体系的构建 ...	148
一、引 言	148
二、“集合产业集群”的代表——“BDA 模式”	150
三、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依赖“集合产业集群”的 发展	160
第十章 典型案例研究.....	163
一、中星微电子的运作模式	163
二、北京北重汽轮机引进与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 方式	170
三、京东方的技术战略与发展路径	179
四、北京·松下的战略演进与学习	190
五、燕京啤酒的品牌发展战略	202
六、Hach 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务拓展	211
七、汉王科技的商业模式创新	215
八、诺基亚星网工业园模式	231
第十一章 首都企业的技术发展路径： 总结和展望.....	243
一、理解跨国公司技术战略	243
二、首都企业的技术发展：可供选择的路径	245
三、首都企业在技术发展中应考虑的其他问题	247
参考文献	257
中文部分	257
英文部分	260

第一章 引言

一、研究背景

全球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MNCs)是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主体,也是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的主体。从全球技术转移的结构来看,技术转移与吸收学习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在获得和利用国际技术转移方面目前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市场激励的作用,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中国企业技术学习的积极性都在迅速提高。现在,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产业结构越来越高级化,企业集约化经营变得越来越迫切。竞争的制胜之道已经从传统的满足市场需求过渡到品质与创新的卓越管理。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资源整合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已经变得至关重要,而这有赖于技术知识优势,包括技术本身、管理经验和能力、品牌管理和市场推广能力等。毋庸置疑,技术知识已经成为竞争的关键。如何取得技术知识,如何持续不断地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从区域经济来看,跨国公司持续投资是首都区域经济总量不断扩张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而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体系内部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消费结构也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众所周知,跨国公司不仅与首都制造业发展紧密关联,而且与企业的技术引进和创新、国际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息息相关。有鉴于此,提升跨国公司与首都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联度,并进一步提升首都企业的技术学习和创新能力就成为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一个重

大现实问题。

结合首都产业发展历史和国家对首都产业发展的要求,首都经济将从过去的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为主的基础性支撑转向以知识流、信息流为主的基础性支撑。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的技术模仿与创新能力、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将成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确立首都经济转型、与跨国公司互联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相互促进的基本关系。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研究的理论意义

世界经济已经持续了 20 多年的飞速发展,其中主要助推力量是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大规模发展。中国 20 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也证实了这个事实。在当前跨国公司在京投资呈现独资化、研发本地化、产业价值链延伸化、空间集聚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功能复杂化的新格局下,首都企业应该如何提高创新能力,推动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的发展动力在哪里? 是自主创新还是吸收学习? 如果是吸收学习,首都企业与跨国公司又是通过何种途径或机制获得所需的技术知识? 正是基于对这些关键问题的思考,我们才展开本项目的深入研究。

从宏观经济来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重大贡献已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它们之间关联性的研究主要归功于新增长理论^①,该理论研究成果表明: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影响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大量的实证研究及各国的经济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

^①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出了“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又称内生(Endogenous)增长理论,这种观点是近 20 年来迅速崛起的一种关于创新的最新理论。新增长理论之所以引起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主要是由于该理论比较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古典增长理论所推论的那样收敛,而是差距越来越大的经济现象,新增长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教育、研发(R&D),以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却严重不足。

一般而言,一国技术进步来源可分为自主创新和从外部引进、模仿及学习。Coe & Helpman (1995)、Eaton & Kortum (1999)、Keller (2001)等人的研究指出,一国技术变化往往不是来自于本国的研究开发活动,而是国外技术转移、扩散的结果。其中,外国直接投资(FDI)尤其是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和其他的技术转移形式向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经济的国家提供技术,同时也激励了东道国企业及研究机构的研究和开发来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

国内有不少学者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近期的研究如沈坤荣(2000)、沈坤荣和耿强(2001)、高嘉勇、刘玲和杨春妮(2006)、赵奇伟和张诚(2006)、张智林(2006)、周庆行和徐姝(2006)等。

沈坤荣(2000)以南京市为例,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市引进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南京市的经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这种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弥补了建设资金的不足,增加了就业,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促进了南京市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增强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了南京市经济的对外开放。

高嘉勇等人(2006)的研究表明:天津市吸引 FDI 的业绩比较突出,并且显示出较大的潜力。在天津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很高的经营效率,是带动所在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天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近期天津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促进 FDI 的大量流入。

赵奇伟和张诚(2006)将京津冀三地 1980~2003 年的面板数据分割为 1980~1992 年、1981~1993 年和 1991~2003 年等 12 个时间段,滚动检验 FDI 经由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1995 年以前京津冀都市圈内存在明显的 FDI 技术溢出效应,而以 1995 年为拐点,FDI 技术溢出效应逐渐消失,直至 FDI 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表明自 1995 年起京津冀都市圈的外资规模相对于内资而言已经偏大。

周庆行和徐姝(2006)从西部九大省市的数据指标出发,分析了西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并以重庆市为例,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经济的作用。

张智林(2006)运用协整分析和构建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对天津市1983年到2003年的FDI和GDP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分析,并依据ECM模型解释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论证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许多研究表明,与众多国家广泛进行国际投资的国家比那些很少进行国际投资的国家拥有更多的向技术发达国家学习的机会。在外国直接投资存在的情况下,具有技术优势的外国公司与当地公司之间有着更多的人员接触。很显然,推动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之一是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在日趋市场化的世界经济中,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主要通过FDI和协作来实现的(Hoffman& Oldham 1991)。由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刺激,西方企业对中国经济潜力认识的增长,再加上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以及可以利用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等因素,外商投资不断增长。尽管外资持续进入,而且中国的政策也倾向于引进“先进”、“适当”的技术。然而,实践表明,通过FDI引进先进技术与政策预期仍然相去甚远。外国投资者更看重利用低劳动成本和宽松的经济特区政策,因此投资大部分集中在科技含量较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Auty 1994; Thoburn & Howell 1995),并且,外资主要通过转包经营实现。那些担负重要职能的部门,如设计、营销仍在海外或境外(Leung et al. 1991; Lan 1996)。另外,大部分外资集中在海外供应的部件组装上,对于本地供应商来说,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机会并不多。

外国直接投资(FDI)给东道国带来的最大利益就是技术转移,有效的技术转移及技术扩散(UNCTAD 1999a)的主体是跨国公司。研究表明,外国投资者会给东道国企业带来新的或者经过改善的管理技术(Allard & Lundborg 1998)。在每一个行业的技术创新中,跨国公司基本上都是主要的推动者。它们一方面通过母子公司内部交易关系把技术转移给其生产体系中的附属企业,包括它们所控制的外国分支机构;另一方面,通过外部

馆、娱乐公园和其他一些房地产领域。为了促使 FDI 投向政府产业政策优先支持的领域,1986 年 10 月 1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根据这项决议,中外合资企业得到了很多优惠,包括税收优惠、简化批准手续、不受官方过多的干涉、无息贷款和保留相互交换外汇权利等政策优惠。对于采用先进技术的出口型合资企业还有额外的税收减免。

自 1994 年以来,中国对一些相关的 FDI 规则和特殊的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并通过对外资企业注册审批程序的紧缩得到体现。新程序包括:对违约的加重惩罚;投资者必须在规定范围内注册资本,以减小实际利用资本与注册资本间的缺口,以及旨在消除投资担保的关于中、外双方分担风险的规定。中国政府同时也表示,将对试图获取贷款和税收方面优惠的虚假外资进行严厉打击^①。1995 年 3 月出版的外资引进方针详细地说明了中国政府当前鼓励的外资种类,同时也说明了限制和禁止的种类。该方针鼓励对高科技部门(也就是化纤、微电子学、精密机械、民航、生物工程和能源开发部门)、基础建设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外资引进。中国政府声明将减少对外国企业综合税方面的优惠。对于在鼓励部门范围内的外商投资,在税收方面继续实行优惠政策,而且允许这些投资者的产品全部在国内范围销售。

1998 年 4 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在 2000 年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税收体制,一个深远的财政变化发生了。为此,外资企业到 2000 年将上缴比当时高一倍的税金。中国政府对外资税收优惠的取消表明对 FDI 实施更进一步的区别对待。这项变化只是政府尝试支持高技术产业而为基础加工业重新制定增长方向的一部分。实际上,中国政府想把 FDI 和国内工业在政策优先方面更紧密、在经济社会目标方面更广阔地等同起来,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

在 1998 年召开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会议中,中国政府指出了今后要重点引进外资的 18 个高科技工业部门,包括高技术工

^① The Financial Times, March 20th, 1995; The Financial Times, May 10th, 1996; The Financial Times, April 16th, 1996.

业、新技术、运输和通信设备、发电、航空、石油化工、机械、电子、医药、医疗设备、纺织品、冶金学、轻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等。这些部门将恢复引进资本设备的自由。会上同时重申了关于外资所有制在诸如核能、卫星、民航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限制的拓宽^①。

加入 WTO 以来,中国吸引外资进入一个新的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根据中国首次对外正式发布的《外商投资报告》和《2003 年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利用外资持续增长,排名直线上升,结构日益优化,来源相对集中,总体运行良好。2002 年,在国际投资继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实际利用外资 527.3 亿美元,增长 12.51%,首次超过美国跃升到全球首位(见表 1-1)。

表 1-1 中国实际使用外国直接投资情况汇总表

阶 段	时 间	中国实际使用外国直接投资数额
起步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	年平均额不到 20 亿美元
起飞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	
	1992 年	首次突破 100 亿美元
	1993 年	首次突破 200 亿美元
	1994 年	首次突破 300 亿美元
	1996 年	首次突破 400 亿美元
稳定阶段	2002 年	首次突破 500 亿美元
	2003 年	561 亿美元
	2004 年	606.30 亿美元
	2005 年	724.06 亿美元
	2006 年 1-11 月	542.63 亿美元

资料来源:2003 年之前(含 2003 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外资》,2004 年第 2 期;2004、2005、2006 年的数据来自商务部外资司网站。

从 1949 年至今,中国在有关技术转移方面的政策经历了很多变化(Battat 1986;Saich 1989;Zhu 1995)。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最重要的技术转移的形式是由苏联(USSR)提供的交钥匙(Turnkey)工程项目投资。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技术引进仍然以设备的完整集合形式或交钥匙工程项目引进(Shi 1998),投资主要发生在以资本主义现代科技为基础的石油化工、钢铁、发电设备和采矿机械工业等领域。在

① The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5th, 1998。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决定开始初步的市场改革并且开放一部分外贸和投资领域。政府对技术转移政策审查后不久发现,先前依靠的交钥匙工程和设备购买途径在很多方面存在问题。交钥匙工程对提高中国科技能力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实践表明,开发技术并应用需要时间,并经常要与技术供应者合作(Lall 1992;Barbosa & Vaidya 1997)。于是,中国围绕科技、农业、国防和工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概念。“四个现代化”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结束了以“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为标志的对外经济政策。

应该说,中国政府和企业引进技术和发展新兴产业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形势真正发生逆转还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入世以来,吸引FDI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出现了新的局面。在许多行业,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步伐加快、力度加大、水平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吸收西方先进技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对于一个复杂现象的研究,最好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本研究涉及到两个研究对象: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的论述中所看到的,本研究首先从本土市场的角度分析了与跨国公司互联的本质就是中外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在分析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所受到的限制,以及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上所具有的优势之后,我们采用博弈分析方法探讨了存在第三方监督和不存在第三方监督情形下的跨国公司投资策略选择,并以1979~2003年的数据验证了IPR和FDI之间的关系。在文献综述部分,我们回顾了跨国公司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东道国技术吸收与学习能力理论等等。对这些早期文献的回顾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也有助于我们对正在研究的问题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